臺大歷史學報第34期
2004年12月，頁247~280

BIBLID1012-8514(2004)34p.247-280
2004.10.12收稿，2004.11.24通過刊登

冷戰時期的德臺軍事交流，1961~1975*

陳　彬**

提　要

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中華民國政府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後，中德雙方源自三〇年代起建立的密切政治與外交關係再也未能恢復。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格於冷戰時期國際情勢，新成立的聯邦德國（西德）囿於「一個德國」政策，力圖避免在臺海兩岸主權爭議問題上明確選邊，因此西德與臺灣的關係僅侷限於經貿、文化交流，很難在政治接觸上開闢新的對話管道。

不過，自六〇年代初期起，在缺乏外交關係的現實下，德臺雙方透過情報合作、派遣軍事顧問與代訓軍官等模式建立起非正式的政府間接觸。直至一九七二年西德承認北京政權並決定停止德臺軍事交流為止，藉由軍事交流與情報合作的模式，德臺雙方突破政治障礙，在傳統外交管道外，開闢新的政治運作空間，不僅維持著戰後兩國間政府層級的聯繫，更為冷戰國際情勢下的德臺雙邊關係賦予特別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冷戰　軍事交流　一個德國政策　情報合作　軍事顧問

---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NSC 92-2411-H-001-029）的研究成果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二、戰後德國與國民政府外交關係的演變
三、德臺軍事交流的肇始——情報合作
四、德臺軍事交流的主要項目
五、結論

一、前言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作為一個軍事與工業強國的德國，一直是處於內憂外患，企圖振衰起蔽的中國效法的對象。雙方在軍事上互動的歷史可遠溯至十九世紀滿清末年，歷經二十世紀初民國肇建，德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中德雙方卻得以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重新發展合作關係，並在三〇年代中達到軍事與經濟合作的巔峰。不過，雙方的合作不久後受到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希特勒親日外交政策影響而蒙上一層陰影。一九四一年七月，德國在日本壓力下承認汪偽政權，導致中國對德斷交。同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後，國民政府繼英、美政府之後對德宣戰，終將雙方十餘年的緊密合作關係畫上休止符。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德國因戰敗而一分為二，國民政府亦退守臺灣一隅。格於冷戰時期國際情勢，在西德官方持守政治上不承認海峽兩岸政權的中國政策，以避免捲入臺海爭議並危及本身利益的作法下，西德與臺灣的關係侷限於經貿與文化交流，雙方政治關係一直無法突破並回復至戰前的正式外交承認狀態。不過，自六〇年代初期起，雙方在正式外交管道外，藉由情報合作與軍事交流的模式，建立起非正式的政府接觸。[1]緣於六〇年代位處於歐亞大陸赤色中國邊緣地帶的臺灣，不僅

1 廣義上軍事交流的內容，除了聘用軍事顧問、武器裝備採購、人員訓練與互訪以及技術合作等事項，更包括了各種軍事情報交換等機密工作。從這一層意義來看，情報合作在本質上是屬於較敏感的軍事交流形式。

是極具戰略價值的軍事基地，更是西方諜報與軍事監控中國的重要據點，其掌握的中國情報對本身缺乏相關情報來源的德國而言，不僅極具價值，更能吸引德方尋求情報合作的興趣。[2]臺灣最高當局亦冀望透過情報合作的方式，建立與德國正式對話的管道，同時更有重行聘請德國顧問來臺協助國軍建軍備戰，並藉機深化雙方政治關係的目的。

因此在德方欲透過與臺灣情報合作以獲取中國情報，以及臺灣意圖藉由軍事交流以達成與德國建立對話機制，雙方互蒙其利的條件下，開啟了戰後雙方軍事交流的序幕。從一九六一年雙方情報機關：西德聯邦情報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BND）與臺灣國家安全局建立起正式的工作合作關係始，繼而一九六三年底以孟澤爾（Oskar Munzel，1899~1992）少將為首的三名德籍顧問首途來臺工作，以及隨後開始的國軍軍官赴德受訓計畫，至一九七五年為止，德臺雙方在情報與軍事方面的合作與交流持續了十四年之久，不僅促進了雙方軍事人員的交流與兩國政府間非正式的接觸，相當程度上也彌補了戰後德臺之間因缺乏外交關係所造成政治上失聯的缺憾。

由於相關史料散佚與事涉敏感，是以迄今研究此一課題之中、德文學術論著尚屬僅見。[3]本文主要利用德國外交部檔案（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當代人士口述訪談，以及國防部史政局庋藏的《國軍檔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與《外交部檔案》等史料作為研究基礎，探討在冷戰的國際關係架構下，德臺雙方如何藉由情報合作與其他軍事交流的模式，重新建構和定位彼此間斷續的歷史關係，並闡釋在此項新的互動基

2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簡稱 PA）, B 14-IIA7/Bd. 1937, Vortragsnotiz Gehlens für von Brentano, May 29, 1956.

3 參見陳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明德專案工作研究〉，《中華軍史學會會刊》7期（2002，臺北），319~350。前留德軍官王玉麒曾編撰《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秘史》（臺北：藏經閣，2000）一書，其中以收錄赴德受訓軍官及其對德國軍事顧問工作的回憶為主。德文論著參見 Chern Chen, “Deutsche Militärberater in Taiwan. Die deutsch-national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Kalten Krieg,”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1/3(2003, München), 385-402。

礎上，德國與臺灣的軍事交流在兩國關係發展中的歷史意義。

二、戰後德國與國民政府外交關係的演變

雖然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德宣戰，不過戰爭期間雙方並未有任何戰爭行為，在國民政府轄地的德籍人士仍受良好對待與法律保護。而日本投降後，關於處理滯留中國的德僑問題，國民政府更是秉持寬大處置原則，蔣介石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指示處理德僑基本方針：「在原則上，德僑不應如日僑同樣之處理，除犯有戰罪者，應予拘辦外，其餘宜應從寬處理」。[4]事實上，在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留用不少德僑技術人員，並未予以遣送回國。此舉曾引起美國政府高度關切，馬歇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致國民政府備忘錄中云：「……中國戰區德僑，因中國政府需留用若干技術人員，遂緩遣送。……惟余覺留用之德僑不應有納粹黨員，……現在中國四千二百名德僑中，至少有一千五百人納粹黨員或附敵有據者需立予遣送。中國政府似宜即將其予以拘禁並將其遣送」。[5]中國戰區美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亦曾代表美國政府提醒國民政府配合遣返政策，儘速將所有在中國的德僑遣返。[6]

與此同時，在一九四五年秋，由佔領德國的美、英、法、蘇四國組成的「盟軍管制委員會」（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in Germany），邀請曾經參加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的十五個國家派遣軍事代表團進駐德國，以便加強盟國間的聯繫，並協調對德管制政策。作為戰後「四強」之一，國民政府於同年九月亦收到邀請書。翌年一月，以前任駐德武官桂永清為團長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德，並於柏林設置辦公處。[7]一九四

4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王世杰呈蔣介石〉（1945.11.16）。以上海地區為例，德僑約二千人，除一百二十名德僑已集中外，餘均仍照常經商，並未拘禁於集中營。此外德僑產業亦未全遭沒收，並且有充分時間將資產轉移及購買貴重金屬。

5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 Memorandum for Chiang Kai-shek, March 11, 1946。

6 《國軍檔案》，檔號 063.1 6010, Wedemeyer to Chiang Kai-shek, March 30, 1946。

7 全名為「駐德聯軍管制委員會中國軍事代表團」。駐德軍事代表團係由原軍令部奉蔣

七年五月國民政府再取得美、英佔領當局的同意，恢復了駐斯圖加特（Stuttgart）總領事館與漢堡（Hamburg）領事館等外事機構，為重建中德關係預作準備。

不過，由於戰後德國處於美、英、法、蘇四國佔領管制之下，新的德國政府一直未能成立，因此國民政府企圖重建雙邊外交關係的努力無法落實。此外，自一九四八年「柏林封鎖」（Berlin-Blocade）事件，以及中共建國以來，英國、蘇聯與東歐附庸國家相繼承認中共政權，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之處境就愈益困難，尤其柏林華僑泰半居留英、蘇佔領區內，代表團推動僑務工作更形不易。[8]此外，國共內戰造成的外匯短絀問題，使得國民政府因經費考量，先後將斯圖加特總領事館（1949.11）與漢堡領事館（1950.1）兩地駐德外事機構裁撤。[9]一九五〇年夏已退居海隅的國民政府財政益形拮据，幾無法有效維持駐柏林軍事代表團的正常運作。因此國防部建議保留該團名義，先將軍職人員調回，團務暫交外交部人員兼理。[10]不過外交部以「該團只具政治上象徵意義，且目前實無任何重要工作，而局勢日亟，一旦有事，撤退不易」為由，堅持裁撤軍事代表團。於是該團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式結束業務，九月二日全體人員離德，[11]自此中德雙方外交管道再次中斷。

就德國方面而言，從一九四九年成立聯邦德國至一九五五年獲得完全自主權為止，德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為尋求國家的主權獨立以及完

介石令於一九四六年核准設立，同年八月改隸國防部。代表團成員計有軍職人員（含團長）七人，文職人員三人（係外交部遴派），總計十人。

8 《國軍檔案》，檔號 062.43 7031.3〈駐德軍事代表團案〉：徐懋禧電國防部（1949.12.22）。

9 《外交部檔案》，檔號 310.1 0003〈調整駐德代表團暨領事館案〉：駐德軍事代表團呈外交部文（1950.4.15）。

10 《國軍檔案》，檔號062.43 7031.3〈駐德軍事代表團案〉：國防部第二廳簽呈（1951.7.3）。一九四八年底因緊縮駐外員額，將軍職人員減至三人。一九五〇年二月因外匯困難，核准將軍職人員調回，團務移由外交部駐團人員兼領。

11 《國軍檔案》，檔號062.43 7031.3〈駐德軍事代表團案〉：國防部第二廳簽呈（1950.8.10）。國防部基於國際形勢需要，主張在歐洲冷戰中心之柏林，保留一軍事機構，以利情報蒐集。因為代表團乃國防部在歐洲唯一的駐外單位，雖然當時僅具政治上象徵意義，然而一旦歐陸國際情勢轉變對臺灣有利時，代表團之重要性將不言可喻。

成與西方世界的整合，其中尤以發展和美國的關係最為重要，[12]根本無暇顧及與國民政府的復交問題。當時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政府認為國家最高目標是免於蘇聯威脅而保障德國的安全與自由，至於德國統一的問題則是等完成與西方整合以及獲得獨立主權之後才應努力的目標，並不列在最優先的範圍內。這點可從艾氏對德國統一抱持寧可推遲，總比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統一德國的觀點中得到印證。[13]不過，在西德的外交目標中，實現國家統一始終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西德政府一直不承認德國分裂的事實，因此在蘇聯佔領區成立的政府組織——東德，並不被西德視為一個合法政權。一九五五年西德恢復國家主權之後，以外交部次長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為名的「霍爾斯坦原則」（Hallstein Doctrine），正式成為西德的外交指導準則。據此西德政府宣稱其為德意志民族唯一合法代表，凡在外交上承認東德政權的國家，西德將斷絕與其外交關係。[14]「霍爾斯坦原則」之目的在於阻止國際間對東德政權的承認以及造成德國分裂的事實，同時也落實西德繼承歷史上德國的唯一代表權利（Alleinvertretung）——即「一個德國」的訴求。

---

12 Friedemann Bedürftig, *Taschenlexikon Deutschland nach 1945* (München: Piper, 1998）, 115. 西德雖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但仍處於美、英、法三國佔領狀態，並未享有完全的國家主權。直至一九五二年簽訂，並於一九五五年通過的「德國條約」（Deutschlandvertrag）生效後，西德才真正脫離了盟國佔領狀態，成為一獨立的主權國家。

13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53-1955* (Stuttgart: DVA, 1994), 444.

14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 (Köln: Verl. Wiss. und Politik, 1995), Dokument 34, 229-230. 東德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後，僅獲得蘇聯和少數共黨國家的承認。這一方面是由於東、西方的冷戰，同時也是由於艾德諾政府堅決反對他國承認東德的政策。在「霍爾斯坦原則」下，西德政府主張祇有西德政府是全德國人民的合法代表，任何第三國對東德的承認，都是對西德的不友好行為，西德即和該國斷絕外交關係。不過西德和蘇聯建交，係「霍爾斯坦原則」實際運用的唯一例外。而西德政府唯恐他國援引東、西德在莫斯科派有雙重代表的先例，承認東德，所以發表「霍爾斯坦原則」，說明西德政府的立場，其用意顯在孤立東德政權，貶低東德的國際地位。直至六〇年代末布朗德（Willy Brandt）主政時代，因推動「東向政策」（Ostpolitik）尋求與東歐共產國家和解，始逐漸揚棄「霍爾斯坦原則」。

因此，西德政府在無暇經營其對臺外交與堅持「一個德國」立場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海峽兩岸主權爭議問題採取既不承認中共，也不承認國民政府的審慎中立作法。特別是在中共已承認東德政權的情勢下，若冒然與國民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不僅將造成兩個中國的法律既定事實，甚至將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競相承認東德的觸媒效應，進而危及本身「一個德國」的立場。[15]因此西德與臺灣的關係僅侷限於經貿與文化交流，很難在政治接觸上開闢新的對話管道。[16]即便國民政府於一九五五年釋出善意，片面宣佈終止自一九四一年起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希冀與西德政府展開外交談判，但德方顧慮直接與臺灣交涉恐引起外界認為西德將在外交上承認國民政府的疑慮，故對此問題均不予以回應。[17]

另一方面，鑑於德臺間已無外交關係之事實，五〇年代初國民政府只得將涉德事務交由駐法與駐比大使館兼辦，同時也委託留德華僑嚴敦炯在波昂與德方政商界直接接觸並拓展對德工作。[18]嚴氏對外雖使用臺糖駐德代表名義，實際上卻是受國防部主管情報的第二廳節制。[19]嚴氏曾於一九五七年藉由德國國會議員馬尤尼加（Dr. Ernst Majonica，1920~1997）[20]之助成立「中德協會」（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作為推動對德外交工作的機構。嚴氏負責兼管該會工作，並奉令改以經

15 PA, B 44/vol. 670, Aufzeichnung, November 11, 1955.

16 PA, B 44/vol. 670, Aufzeichnung, November 23, 1955.

17 PA, B 12/vol. 657A, Generalkonsulat Hongko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June 5, 1959.

18 《外交部檔案》，檔號312.1 0005〈促進中德關係案〉：汪孝熙電外交部（1958.3.5）。

19 嚴敦炯先生致作者函（2001.11.18）。嚴氏（1914~）早年留德，獲柏林科技大學博士學位。戰後任職於駐德軍事代表團調查組，負責蒐集戰後德國兵工人才與資料。代表團裁撤之後續以臺糖代表名義為國防部第二廳工作，五〇年代末工作範圍擴大，改以經濟部駐德代表名義，由國家安全局領導，實際主持對德聯繫工作。

20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二年間，馬尤尼加任基督教民主黨（CDU）聯邦眾議院議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年任該黨外交委員會主席。馬氏與臺灣關係良好，在國會中推動臺北—波昂關係正常化與爭取國民政府在德國設立半官方代表處，不遺餘力。Rudolf Vierhaus and Ludolf Herbst eds.,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Mitglieder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949-2002* (München: Saur, 2002), 533-534.

濟部駐德代表名義，同時直接受國家安全局指揮，[21]實際上成為臺灣駐德國非官方代表，以及德國經貿、軍情界與臺灣交涉的主要對象。[22]

事實上，國民政府在戰後為恢復雙方政治關係所付出的努力成效甚微，兩國間除了規模有限的經貿與文化活動外，幾無官方政治對話。直至六〇年代末為止，西德外交部仍一直排除與臺灣當局進行政治對話的可能性，[23]並對臺灣官方一直設法把不屬於德國駐臺半官方機構「文化中心」之領事、經濟與新聞等工作擴及文化中心之上，企圖經由迂迴途徑使該中心具有事實上官方代表處之工作，造成外界德臺官方接觸印象一事表達不滿。[24]西德政府更不斷重申德國恪守在中國問題上中立的立場，並指出德國雖然和臺灣維持經貿與文化關係，但卻無法促進雙邊政治關係。換言之，德國雖在經濟與文化事務方面願意和臺灣接觸，但在政治上卻對臺灣保持距離。實際上，德國在中國和臺灣關係問題上所持的中立立場，不過是德國在政治上對臺灣保持距離的藉口，為的是預留日後與中國交涉的政治空間。[25]此一則由於海峽雙方土地與人口的懸殊比例關係，臺灣與中國在土地面積的比例為1：266，在人口方面則為1：53。此外在經濟方面，中國廣大的消費市場潛力對西方工業國家而言，更是遠較臺灣市場具有巨大吸引力。[26]基於此，在顧及重行打開戰前廣大中國市場的可能性以及中國未來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西德政府將反共意識型態暫放一旁，以維持政治中立之名，為未來中德雙邊發展保留更大的行動自由，顯然更符合自身國家的長遠利益。[27]因此，

21 嚴敦炯先生致作者函（2002.2.19）。

22 PA, B 12/vol. 658, Majonica an Legationsrat Strätling, December 30, 1957.

23 PA, B 12/vol. 657A, von Brentano an Majonica, October 7, 1960.

24《外交部檔案》，檔號311.1 0001〈中德政務案〉：Willy Brandt to Dietrich Rollmann, May 15, 1968。

25 PA, B 37/vol. 519, Aufzeichnung, July 15, 1969.

26 Werner Kilian, *Die Hallstein-Doktrin. Der diplomatische Krieg zwischen der BRD und der DDR 1955-1973. Aus den Akten der beiden deutschen Außenministeriu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1), 307-308.

27 PA, B 44/vol. 813, Ministerialdirektor Reute an Generalkonsulat Hongkong, January 3, 1967.

在德方這種國際政治與經濟雙重考量下，德臺間政治運作的空間隨著中國國際角色逐漸顯著而被壓縮至最小，同時也突顯出臺灣在國際政治的現實條件下，單方面企求與德國恢復外交關係之主觀意願的不切實際。

三、德臺軍事交流的肇始——情報合作

不過，隨著冷戰時期國際局勢演變的詭譎，德臺互動關係卻出現新的運作空間。緣由於冷戰時期，中共對亞洲的軍事威脅與日俱增，使蔣介石統治之下的臺灣具有「首當其衝」的戰略地位。而正由於德國對中國懷抱有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憧憬，因此五〇年代末期，出於對中國情報蒐集的需求，反而給予西德與臺灣情報合作的構想產生推動力。[28]

事實上，為擴大情報蒐集與運用的效果，冷戰初期西德即與不同國家情治機構透過情報交換方式，加強對外聯繫與合作。[29]這種合作目的在進行各種形式和內容的雙邊祕密情報交換，情報交換不僅是祕密情報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各國情報合作的形式。而冷戰時期位處於歐亞大陸共產政權邊緣地帶的臺灣，不僅極具戰略地位，更是西方諜報與軍事監控中共的據點，其中美國在臺灣就曾設置電子偵測設施，全面監控中國南部的軍事活動。另一方面，戰後德國情報單位缺乏熟悉中國事務的官員，使得西德政府不得不依賴國外提供情報。因此臺灣所處的特殊地理地位，反而促成兩國之間情報交換機制的形成，尤其是臺灣足以提供德方本身所欠缺的大陸情報資料參考。

德臺間的情報合作關係，追本溯源其實早於五〇年代初期，德國情

28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Munich（德文紀錄）.烏爾班（Joachim Urban, 1922~）為前德國陸軍上尉，戰後曾任職於聯邦情報局主管情報分析的第三處（Abt. III: Auswertung）遠東科（Fernost）副科長、科長，主管對臺情報合作，一九八五年以備役上校退休。

29 Peter F. Müller/Michael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Der BND: Geheime Politik und schmutzige Geschäfte* (Hamburg: Rowohlt, 2002), 325.

報機構負責人蓋倫[30]就曾經與臺灣政府代表進行接觸並維持工作上的聯繫。[31]不過，一直要到一九五九年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以及一九六〇年參謀總長等相繼赴德訪問，[32]與德國軍方和聯邦情報局負責官員為雙方具體合作的可能性進行會談，[33]並討論臺北所提派遣國軍軍官赴德接受軍事訓練事宜後，[34]始逐漸開啟戰後德臺雙方軍事交流的序幕。

一九六一年三月間，時任聯邦情報局局長的蓋倫指派該局「戰略情蒐」（Strategische Aufklärung）部門主管朗考（Wolfgang Langkau）准將，祕密抵臺訪問。期間朗考除蒙蔣介石接見外，主要任務是與國家安全局交換情報工作經驗並洽談雙方電訊監聽技術合作事宜。[35]朗考的來訪，代表德臺雙方有意在正式外交管道以外，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交流模式以利雙方軍事、情報合作的開展。隨後在德國國防部長史特勞斯

30 蓋倫（Reinhard Gehlen，1902~1979），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服務於陸軍參謀總部擔任「東線敵情署」（Fremde Heere Ost）署長。戰後由於冷戰繼起，東西方關係緊張，蓋倫對蘇聯情報工作以及情報佈線的經驗深獲西方陣營重視，故在美國軍方資助之下成立「蓋倫組織」（Organisation Gehlen，即一九五六年成立的聯邦情報局前身），受中情局（CIA）指導，繼續負責蒐集共產集團情報工作，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八年出任德國聯邦情報局首任局長。

31 嚴敦炯致作者函（2002.2.19）；《外交部檔案》，檔號312.1 0016〈對西德談判復交案〉：駐法段代辦「訪西德報告」摘要（1953.7.21）。

32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外交類．國際情報及宣傳》，卷13，目次號16〈鄭介民呈蔣介石報告〉，1959.4.17。PA, B1/vol. 129, Strauß an von Brentano, November 2, 1960.

33 殷宗文將軍訪談（2001.10.9，臺北）。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間殷氏曾赴德國漢堡指參學院受訓，回國後歷任旅、師長、軍團參謀長、澎防部司令、國防部軍情局局長、國家安全局局長以及國安會秘書長等要職。

34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35 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檔案：忠勤檔案——中德》，檔號1〈西德勞倫茲將軍與魏大銘將軍會談電訊測聽技術合作紀要〉（1961.3.20）；檔號2〈西德勞倫茲將軍建議我方應加強中東非洲印尼方面工作〉（1961.3.21）。上述文件中記載的勞倫茲將軍即為朗考職務上的化名，參見嚴敦炯致作者函（2001.11.18）；Erich Schmidt-Eenboom, *Undercover: Der BND und die deutschen Journalisten* (Köln: Kiepenheuer & Witsch, 1998), 198, 261-262, 293; Heinz Höhne/Hermann Zolling, *Pullach intern: General Gehlen und die Geschichte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Hamburg: Campe, 1975), 224-225.

（Franz Josef Strauß，1915~1988）的支持下，[36]一九六二年該部所屬軍事情報局（Militärischer Abschirmdienst，MAD）局長威瑟爾（Gerhard Wessel，1913~2002）將軍，亦來華與國防部第二廳洽商雙邊情報合作的可能性。[37]

當時德臺軍事與情報交流的主要管道，是透過國家安全局與西德聯邦情報局。[38]聯邦情報局直接隸屬於總理府，局長直接對總理負責，蓋倫本人反共意識型態濃厚並預期未來蘇聯將與西方盟國爆發軍事衝突，[39]因此他對於同是以反共政治號召掛帥的臺灣表示好感並積極推動合作。更重要者，厥為總理艾德諾個人態度對雙方情報合作的影響，雖然他贊同德國在「中國問題」上維持中立的一貫立場，但並未僵化到以此政策為進行國際合作的唯一思考。顯然在與臺灣情報合作的問題上，他技巧地在外交原則與政治現實中找到平衡點。易言之，德國與臺灣當時的軍事及情報交流，若無德國政府高層默許，根本毫無政治運作的空間。[40]

事實上，外國與臺灣進行情報合作，主要是欲藉臺灣瞭解中共，並在情報來源上擴大蒐集管道。在冷戰期間西方蒐集中共情報十分艱難的

36 Archiv für Christlich-Soziale Politik, NL Strauß BMVg:517, Strauß an Gehlen, March 29, 1962; PA, B 1/vol. 129, Strauß an von Brentano, November 2, 1960. 和外交部所持「一個中國」政策相反，德國國防部在史特勞斯擔任部長時期（1956~1962），明顯支持聯邦情報局為防堵蘇聯共產勢力擴張而尋求對外合作——包括對臺接觸進行軍事合作的立場。

37 威瑟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於陸軍參謀總部「東線敵情署」任參謀，後累遷至副署長，一九四五年四月接替蓋倫出任東線敵情署署長以迄敗降。戰後威瑟爾曾在「蓋倫組織」中擔任情報研析部門主管。一九五五年轉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一九六八年接替蓋倫職務，擔任聯邦情報局第二任局長，迄一九七八年退休。Reinhard Teuber, *Die Bundeswehr 1955-1995* (Norderstedt: Militair-Verlag, 1996), 58, 113; Christian Zweng ed., *Die Dienstlaufbahnen der Offiziere des Generalstabe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5-1945*, vol. 2 (Osnabrück: Zeller, 1998), 395.

38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39 Reinhard Gehlen, *Der Dienst. Erinnerungen 1942-1971* (Mainz: von Hase & Koehler, 1971), 345ff.; Norbert Frei ed., *Karrieren im Zwielicht*, 135.

40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October 20, 2003；嚴敦炯先生訪談（2003.11.7，德國波昂）。

情況下, 五〇年代末期臺灣情報單位對於中共政經動態以及西藏情勢的情報蒐集能力，卻深受歐美情報單位重視。[41]尤其歐美國家首重中共戰略情報, 藉以全面評估中共的政經實力, 而相較於美國與臺灣之間的情報合作關係, 德國的合作態度更為務實, 尤其在技術轉移方面, 提供臺灣不少協助。[42]以六〇年代中聯邦情報局曾協助臺灣設置無線電通信電臺為例, 不僅提高了臺灣對大陸情報蒐集的效率, 更確保了情報傳遞的隱密性。[43]另外在電子情報解析技術轉移方面, 德國也遠較美國具有誠意, [44]聯邦情報局不僅與國家安全局合作對大陸實施無線電監聽, 獲得對雙方均極具價值的戰略和軍事情報，並與臺灣合作研發先進監聽技術和設備，應用在對大陸軍民用通訊的監聽、偵測與密碼破解等工作上，[45]因此雙方合作可謂互蒙其利。

實際上，聯邦情報局在亞洲地區主要的情報合作對象是日本與臺灣。不過, 由於日本情報單位並不重視政治偵蒐與軍事情報交換, 德日的情報合作可謂乏善可陳。相較之下, 聯邦情報局與臺灣方面的工作關係卻隨著時間推移而愈形密切。[46]特別是在一九六八年威瑟爾繼蓋倫出任局長後，確立了對國外情報蒐集為聯邦情報局的首要工作目標。[47]而為達成此目標，除了正式情蒐管道外，擴大對外情報蒐集的來源，並繼續與他國進行情報合作及情報交換就成為最重要的情報蒐集方式。

不過德國政府, 尤其是外交部對於與臺灣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交流

41 翁台生，《CIA在臺活動祕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臺北：聯經，1991），96、108。除與中情局合作外，臺灣軍方自五〇年代中起也開啟與美軍方的情報合作。參見《國軍檔案》，檔號0420.2 5000〈海軍中美電訊情報合作1955〉、〈陸軍總部與美軍情報協定1962〉。

42 劉鳳翰等訪問，《汪敬煦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3），179。

43 Erich Schmidt-Eenboom, *Schnüffler ohne Nase: Der BND. Die unheimliche Macht im Staate* (Düsseldorf: Econ, 1993), 186, 267.

44 翁台生，《CIA在臺活動祕辛》，171~172。

45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46 Peter F. Müller/Michael Mueller, *Gegen Freund und Feind*, 542-543.

47 Heinz Höhne/ Hermann Zolling, *Pullach intern*, 259.

一直抱持反對態度，唯恐一旦曝光，將對德國外交政策與國際視聽造成不利影響。[48]事實上，德國方面包括聯邦情報局在內，一直明示臺灣當局不要存有藉機恢復雙方外交關係與官方接觸的不切實際想法，因為波昂與臺北的一切合作交流都以不危害未來與中國發展關係為前提。[49]德國如此重視與中國發展關係的問題，主要源自於六〇年代初的中蘇共分裂以及日益劇烈的越戰，使得中國在共產陣營與國際衝突中所具有的關鍵地位日益突顯。[50]中國國際地位的轉變對國際關係影響重大，首先是促使中美兩國各自修正本身的外交政策，朝向修復雙方關係改變。美國是西德最重要的盟邦，由於華盛頓已開始修正對中共的態度，自然也影響到西德政府的決策。而德國則是希望有朝一日藉由中德蘇三邊外交關係的建立，從兩大共產勢力的紛爭中得到外交上的制衡。同時，西德政府也認為，德中關係的修復可以讓莫斯科感受政治壓力，並對諸如柏林問題、德國統一以及歐洲安全等議題，作出更多的善意回應。[51]

不過，臺北方面則一直不放棄任何可能與波昂恢復外交關係的機會，但是由於波昂對北京與臺北之間不確定的三角關係，尤其是德國外交部長年遵行在中國問題上維持中立政策的主導下，使得德國政府在與中國主權有關的敏感問題上，不願冒著可能損害與北京之間關係的危險，而逕與臺灣發展政治關係。雖然臺灣本身的國際地位在西德外交政

48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簡稱BA-MA), N 447/90, Herz an Munzel, January 30, 1969.

49 BA-MA, N 447/90, Urban an Munzel, January 14, 1969.

50 中蘇共分裂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主要開始於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宣佈要與美國和平共存，引起堅持共產主義教條路線的中共不滿，而對蘇聯的外交政策進行撻伐。一九六〇年蘇聯撤走中國境內所有的科技與經濟顧問，雙方領導人公開批評對方，中國指控蘇聯為「修正主義」，兩國關係陷入緊張。隨後，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中，蘇聯立場的軟化與次年簽署核子禁試條約，在中共眼中，蘇聯的作法無異是對資本主義屈服。而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期間，蘇聯提供印度軍事物資，更加深中共的疑懼。最後，爆發於一九六四年的中蘇邊界衝突，造成中蘇共關係的決裂，雙方邊界衝突在一九六九年時幾乎演變成為一場戰爭。

51 PA, B 44/vol. 813, Vermerk über Chinapolotik, March 28, 1966;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3* (München: Oldenbourg, 1994), Dokument 465: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I. Klasse Wickert, December 11, 1963.

策考量中，並不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但是臺灣對於中共政情與軍事訊息、意圖等戰略情報的掌握，對德方卻有無可替代的價值。於是雙方在上述國際政治背景下，逐漸發展出雙邊情報合作關係。[52]不過基於現實政治考量，特別是西德外交部始終反對與臺北發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因此，聯邦情報局對於與臺灣進行情報合作一事，一直保持低調而且謹慎的態度。[53]毫無疑問，西德這項外交與情報單位雙頭馬車式的對臺政策，顯然是以德國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尤其是為了不損及各種針對中國的聯合情報任務，直至七〇年代中，聯邦情報局仍然繼續祕密提供臺北顧問諮詢以及後勤支援，以強化臺灣政府情報偵蒐能力與鞏固雙方情報合作基礎。[54]雖然德國的外交政策從一開始就排除了與臺灣進行外交與政治交流的可能性，並將與臺灣的政治關係減至最低，使臺北希望藉由情報合作而能與德國改善雙邊政治關係以及恢復外交關係的願望落空。但是從德臺間情報合作的實質內容來看，雙方的情報機構卻成功的越過外交障礙，而成為介於西德政府與臺灣當局間唯一的官方溝通管道，並發展出另外一種新的交流模式，不僅為雙方後續的軍事交流奠定互信基礎，更使得雙邊情報合作成為德臺軍事交流中最重要的一環。

四、德臺軍事交流的主要項目

（一）召募德國軍事顧問

在六〇年代初，臺灣方面除了冀望透過與德國情報合作的方式，建立雙方政治對話管道外，更有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協助國軍建軍備戰的另一層目的。因此在朗考訪華期間，蔣介石即親自託其代向德國當局

52 殷宗文將軍訪談（2001.10.9）。

53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54 殷宗文將軍訪談（2001.10.9）。

商洽並物色適當人選。[55]而就軍事層面而言，早在剿共戰爭失敗退守臺灣之初，國軍內部問題與各種弊端就已暴露無遺。蔣介石曾分析國民黨在大陸上失敗的原因時，說道：「……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軍事之所以崩潰，是由於我們軍事上的制度——諸如教育制度，未能健全的建立起來，……而軍事教育尤未能養成革命軍人應具有的學問和精神」。[56]鑑於國軍裝備、訓練不足，士氣低落，幹部素質極差，[57]為了迅速積極恢復戰力，蔣介石認為要徹底改造軍隊的缺點，振作軍隊精神，轉移部隊風氣，根本之道乃在於建立良善的教育制度，因此來臺之初即決定洽請一批前日軍參謀軍官來臺負責訓練國軍幹部。[58]不過，引進日籍軍事顧問並不是蔣介石當時的唯一選項。事實是國民政府先前曾試圖聘請美、德軍事顧問，但在美國發表白皮書，改變對華政策，以及西德尚未恢復主權的情勢下，使得聘請美、德軍事顧問的嘗試遭逢頓挫。因此聘任日籍教官，成為國民政府為「挽救當前的危機」，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事實上，蔣介石再次尋求德國軍事顧問來臺訓練國軍有其歷史脈絡：早在三〇年代，德國對於中國軍事事務革新的影響力就超越所有西

55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October 20, 2003.

56 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1949.10.16），引自《蔣總統思想言論集》（臺北：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1966），卷19，396~397。此篇為蔣介石於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一期開學典禮上之演講詞。

57 Monte R. Bullard, *The Soldier and the Citize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44-45.

58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明德專案教授孟澤爾覲謁總統談話紀錄（1964.4.1）；蔣氏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中設置「軍官訓練班」，從事軍事幹部教育。同年五月，「軍官訓練班」擴大為「軍官訓練團」，其全名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圓山軍官訓練團」，由蔣介石自兼團長，日籍教官負責教學。該團曾舉辦學員隊十期，以營級幹部為主要召訓對象，教育時間每期五週。一九五一年四月，開辦高級班，召訓團級以上重要幹部，共訓三期。一九五二年元月，該團改制為陸軍指揮參謀學校，而另以其部分組織為基礎，於同年八月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學研究會，以「實踐學社」為其代名。該社並開辦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簡稱石牌聯戰班），直至一九六五年八月結束。

方國家，這應歸功於在賽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與法肯豪森將軍（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領導下德國軍事顧問團工作的成果，其對國軍軍事改革、興建國防工事以及對日戰爭的軍事整備等方面貢獻卓著，深獲蔣氏信任與讚賞。不過，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德國顧問的主要任務在於訓練國軍軍官、教育部隊、改革戰術以及督導軍隊現代化的進程。更重要的是，德國顧問謹守專業諮詢立場，並不像日後美軍顧問一般，曾試圖干涉國軍指揮或對政策施加影響力。[59]

雖然日後受希特勒聯日政策影響而中斷德籍顧問在中國的工作，但德籍顧問勇於任事的作風在蔣氏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前德國駐華軍事顧問中，史坦（Bodo von Stein）與史脫次納（Erich Stoelzner）兩人更隨政府輾轉來臺服務，後者經轉戰海南島，來臺後又隨孫立人在新軍以及桂永清在海軍總部服務，總計在國軍中服務達二十二年。[60]此外，戰後蔣氏仍不斷在經濟上資助前德籍顧問。國民政府高層優遇德籍顧問，除了蔣介石對維繫私人情誼與對舊時德國關係念茲在茲外，更重要的是冀望透過德方友華人士努力，與戰後西德政府重新建立中斷已達十餘年的外交關係。[61]其次，藉由再次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工作，亦可為雙方建立政治上溝通的另一條管道，並漸次將雙方關係擴及政經方面合作，最終爭取德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提昇中

59 Chern Chen, “Deutsche Militärberater in Taiwan. Die deutsch-national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Kalten Krieg, ”393.

60 《朱家驊檔案》，240/2〈與德人來往函（一）〉：Stoelzner to Chu Chia-hua, April 1, 1950, June 18, 1950, June 24, 1952；《國軍檔案》，檔號062.32 2423〈德籍顧問史脫次納出入境及薪津案〉。由於臺灣經濟情形欠佳，史氏當時月薪在1500~1800臺幣之間，較之國軍軍官待遇仍算優渥。不過顧問待遇不足支付其在德國親人所需，故時任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允准每月結匯五十美金，作為兩人額外的安家費用。

61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勘亂時期》，檔號16879 61〈蔣中正電俞國華譚伯羽代發美金五千與三千元予陳立夫胡適及鷹屋〉（1953.7.17）。BA-MA, N 246/17, Hsueh Chi-hao an Falkenhausen, August 5, 1947。在戰後民生極度匱乏的時代，蔣氏曾指示兵工署將一筆高達三千美金的贈款轉匯予法肯豪森。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年間法氏遭盟軍羈押期間，國民政府並曾寄送民生物資接濟法氏家人。

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最後，也是現實政治下最實際的考量，蔣介石尋求美國之外軍事合作的對象，出自他對美國不支持臺灣反攻大陸計畫的反彈。[62]美國軍援臺灣，不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主政期間，主要目的在於提高臺灣軍隊的防守能力而不是攻擊能力，因此在策畫與執行軍援計畫的過程中，連帶地削弱強化國軍戰力的政策目標。[63]換言之，美方並不支持臺灣對大陸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更經常對臺灣軍隊訓練、戰備實施與後勤能量的增加予以密切監視。[64]因此，既然美國無意幫助蔣介石重返大陸，與其他國家合作也就成為臺灣當時另一種合理的選擇。尤其是德國的軍事傳統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驗證，其戰術思想與作戰意志不僅適合在兩岸軍事實力對比與臺灣國防現況下運用，也更切合蔣氏反攻大陸計畫中國軍部隊之所需。[65]

事實上，當時臺灣不是唯一對德國的軍事傳統與軍事實力感到興趣的非共產國家，在戰後德國軍事顧問就曾活躍於埃及、敘利亞等中東國家。[66]隨著東西方對抗情勢日益尖銳，五〇年代初期甚至美國對於如何

6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No. 15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Kirk, September 6, 1962. 對於美國不支持自己的反攻大陸計畫，蔣介石頗感懊惱，曾指控美國敵友不分，並意圖掙脫美國以共同防禦條約責任加諸在其身上的束縛，取得行動的自由。

63 Karl Lott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P of Washington, 1964), 214.

64 賴啓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4），267~268。

65 Friedrich W. von Mellenthin, *Schach dem Schicksal. Ein deutscher Generalstabsoffizier berichtet von seiner Herkunft, seinem Einsatz im Zweiten Weltkrieg und seinem beruflichen Neubeginn nach dem Kriege* (Osnabrück: Biblio, 1988), 237-239; John A. English/Bruce I. Gudmundsson, *On Infantry* (Westport: Praeger, 1994), 9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各項戰役中，有一點最值得注意的是德軍並不是依恃豐厚的物質條件，而是經常處於後勤短缺的狀態下，進行一場「窮人的戰爭」（Poor Man's War），即使它的人員與裝備都比英美盟國少，卻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戰鬥力量，在各戰場堅持戰鬥數年。尤其在戰爭末期面臨各戰線軍事重壓，德軍抵抗盟軍攻勢卻仍然堅強而有效率，不得不歸功於部隊領導統御之卓越，這種堅強戰鬥力是其他國家軍隊難以匹敵的成就。

66 Oskar Munzel, *Erinnerungen* (Manuscript), 46-50; Joachim Tzschaschel, *Zeitseuge in*

有效利用德國軍事潛力也愈發感到興趣，尤其是西方民主陣營中唯一曾在上次大戰中與蘇聯進行過大規模實兵作戰的國家只有德國。[67]而一九五五年以前德軍成員為骨幹而成立的聯邦防衛軍（Bundeswehr），自然也成為北約國家中對抗蘇聯可能軍事入侵西歐最重要的武裝力量。特別是那些曾在上次大戰中於東歐以及最後保衛德國等戰場，指揮過大部隊與蘇聯紅軍作戰的現役及退役將校，更受到缺乏與蘇聯作戰經驗所困的英美軍事領導階層重視。因此經常受邀參與高司兵棋推演、戰史研究或是進行戰略問題研討等，目的就是為汲取上次大戰德軍的經驗教訓，並藉以檢視北約組織在中歐的防衛戰略。[68]

基於上述考量，並為適應新的形勢與任務，蔣介石認為國軍在指揮體系、軍隊組織、部隊裝備與訓練上都有必要作調整，並要求深入研究德國的戰爭經驗與聯邦防衛軍對於面臨優勢敵人戰鬥的訓練方法，俾使國軍也能從中獲得新的啟發，[69]同時透過聯邦情報局管道向德方要求遴選軍事顧問來臺協助訓練國軍。而為滿足臺灣方面對軍事交流方式的需求，更為鞏固雙方情報合作的基礎，聯邦情報局很快就對軍事顧問一事作出回應。[70]有關顧問主要人選，臺北方面最初屬意前德軍二級上將溫克將軍（Walther Wenck，1900~1982），溫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任高級司令部參謀長、陸軍參謀總部作戰次長，並曾擔任過軍團司令，是一位歷練豐富的職業軍人，也是自三〇年代賽克特將軍以降中方尋找德國軍事顧問中位階最高者，其中也反映出蔣介石對於尋覓顧問一事重

Bagdad, Algier, Saigon.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Militärattachés (Frankfurt a. M.: Haag+Herchen, 2000), 11-16. 一九五一年起，在前德軍將領法恩巴赫（Wilhelm Fahrmbacher, 1888~1970）領導下，為數約四十人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在埃及成立，顧問成員涵蓋步、砲、裝甲兵科以及傘兵、特種作戰與海戰方面的退役軍官，協助新近自英國殖民統治中獨立的埃及政府，訓練軍隊與戰備整備。

67 Detlef Bald/Johannes Klotz/Wolfram Wette, *Mythos Wehrmacht. Nachkriegsdebatten und Traditionspflege* (Berlin: Aufbau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69.

68 Friedrich W. von Mellenthin, *Schach dem Schicksal*, 241-248.

69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明德專案今後發展之可能性（1975.5.5）。

70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October 20, 2003.

視的程度。

不過溫氏本人對於赴臺出任軍事顧問一職意願不高，[71]後經德國國防部與聯邦情報局協商，為避免遴派現役將領可能會引起的外交爭議，因而共同向臺灣推薦甫自軍中退役的孟澤爾將軍。[72]與溫氏經歷迥異，孟澤爾除了在戰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曾擔任過高級司令部參謀外，其餘時間全都是擔任裝甲部隊指揮官職務，從營、團長累遷至裝甲師師長，並轉戰歐洲東西線戰場，作戰指揮經驗豐富。五〇年代初曾赴埃及擔任軍事顧問，更重要的是聯邦防衛軍成立後，孟氏在重建德國裝甲部隊過程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73]孟氏的經歷對於亟欲借重德方將領指揮作戰經驗以及領導組織能力的臺灣來說，亦可謂一時之選。

（二）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

在聯邦情報局居中聯繫下，一九六二年中孟澤爾首肯赴臺擔任顧問工作。[74]經雙方前置作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孟氏首次應聘來臺，隨從的助手是聯邦情報局派出的費爾伯（Bernhard Faerber）少校，兩個月後由葛西尼（Gottfried Garzini）少校接替。孟氏首次來華是以國防研究院軍事科學組訪問教授名義為掩護，[75]至翌年五月二日返德，在臺工作時間約半年。[76]

---

71 Dermot Bradley, *Walther Wenck. 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Osnabrück: Biblio, 1985), 395-407, 411.

72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October 20, 2003.

73 孟澤爾，一九四一年進攻蘇聯時出任第三裝甲師戰車營營長、團長。後歷任裝甲兵學校指揮官與裝甲師師長。戰後孟氏被拘禁於美軍戰俘營，一九四七年七月始獲釋。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間轉赴埃及擔任政府軍事顧問。一九五六年加入聯邦防衛軍，被授予准將軍階，並出任位於蒙斯特（Munster）之裝甲兵學校校長。一九五七年擔任陸軍教育訓練署（Truppenamt）裝甲兵監，後擴編為戰鬥部隊監，主管裝甲、裝步、山地兵、空降兵與空騎各兵種以及所屬兵科學校的教育訓練事宜，一九六二年以少將軍階退役。Oskar Munzel, *Erinnerungen*, 16-55.

74 Oskar Munzel, *Erinnerungen*, 56.

75 BA-MA, N 447/90, Chang Chi-yun an Munzel, September 20, 1963.

7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明德專案工作紀實》（臺北：史政編譯局，1980），上冊，23。

由於德國軍事顧問的聘請是由蔣介石親自主導，臺北方面更希望藉由聘請德籍顧問與軍事合作，加強中德雙方的政治關係，[77]因此孟氏在臺期間，深獲各級軍事單位的配合。孟澤爾將軍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七四年間，曾經先後以國防部長、參謀總長或陸軍總司令首席顧問身分，來臺工作九次之多，同時孟氏也曾為國軍蒐集大量德軍在作戰訓練以及教育上的典令與參考資料以資運用。[78]自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五年十三年間，臺灣逐年續邀德方顧問來臺，總計共有二十四名德籍顧問，先後來臺工作十三次，而孟氏是所有顧問當中，來臺次數最多、影響也最大的一位。[79]來華工作的德籍顧問中除了以顧問身分作為掩護，並負有情報任務的西德聯邦情報局官員外，其餘都是曾歷經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服務於聯邦防衛軍的退役軍官。[80]他們不僅實戰指揮經驗豐富，並多具有參謀軍官資格與兵科教官、部隊長以及高級司令部參謀等職務歷練，對銳意進行軍事事務革新，並借用德國經驗以利國軍戰備整備的蔣介石而言，他們無疑是最適合的人選。

當時為避免引起「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MAAG）人士誤會，聘用德籍顧問一律對外界保密，並不得對外發佈新聞以及禁止拍攝照片。此外，德籍顧問均係以私人身分應聘來臺，對外均以「教授」（中國文化學院歷史教授）見稱。[81]德籍顧問每年在臺停留時間二至六個月不等，其中有連續留任者，有初任返

77 BA-MA, N 447/90, Chang Chi-yun an Munzel, June 17, 1964.

78 施震宙，〈孟澤爾將軍在臺灣〉（上），《聯合報》（1999.3.14，臺北），8版。

79 在華德籍軍事顧問團，按領導人物不同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孟澤爾，第二階段是若爾丹（Paul Jordan, 1910~2000），而人數最多的考夫曼（Kurt Kauffmann, 1912~1991）則是第三階段。德籍顧問詳細名錄及工作時間表，參見附表一；另德籍顧問在臺詳細工作內容參見陳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明德專案工作研究〉，328~339。

80 《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下冊，309~327。其中除費爾伯少校、葛西尼少校、福克曼（Gerd Volkmann）中校、普勒爾（Albert Prell）中校、鐵格納（Herbert Tilgner）上尉與佛美爾（Klaus Vollmer）少校等六人為現役軍官並任職於西德聯邦情報局外，餘均為退役軍官。

81 Oskar Munzel, *Erinnerungen*, 57.

國後即另改派者。顧問來回旅費皆由臺灣軍方負責，並按月發給薪酬。[82] 這類交流是在不曝光的原則下祕密進行，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五年五月結束，歷時十三載，臺灣軍方稱為「明德專案」。

德國軍事顧問的工作範圍，是就視察單位提出建議與協助部隊訓練為主，並以陸軍部隊為主要工作對象。此外，以現代戰爭觀點來看，國軍將領缺乏嚴格的軍事指揮教育訓練，並極少展現現代軍事戰術或技巧方面的知識。因此德國顧問亦肩負訓練國軍指揮參謀人才的責任，藉由參訪、演講、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習等方式，將德軍的指揮參謀原則運用於旅、師、軍等階層的戰術來傳授國軍將校，並置重點於兵種協同及軍種聯合作戰的指揮。[83]

德國顧問同時以座談、書面與會談報告方式，提供臺灣軍方建軍備戰之建議。其中建議的重點首在國軍組織改革，其時國軍總兵力約有六十萬人，然而訓練及裝備卻嚴重不足。造成國軍員額龐大的主因是由於蔣介石強調的「反攻大陸」思想，這個教條式的思想對國軍的軍事結構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德籍顧問指出，國軍如欲求其現代化，應該先從精簡員額著手，將師數量減少，以節約財力來逐步達成。換言之，以當時德國人口四倍於臺灣之事實，而維持之陸軍部隊數量卻約與臺灣相埒，因此國軍應該維持規模較小而武器裝備較佳並且訓練精良的軍隊型態。[84]

其次，重新檢討美軍組織模式對國軍的適切性：「美國的軍事體制乃植基於富強之國力，經濟力較弱的國家如果採取同一模式，則形成處處浪費，左支右絀。而在作戰指揮方面，美軍又較為呆板，且過於拘泥

82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國防部（61）猛攻字第3361號令（1972.7.20）。根據顧問工作協議書，有關顧問月薪、旅費以及在臺膳宿給付規定如下：一、月薪不繳稅金發給；二、顧問在第一學期結束後獲延約者，其在德期間按月薪百分之二十五給予，以作為下學期來臺準備工作及蒐集資料與履行書面專題研究之酬金；三、顧問之來回程飛機票供給頭等艙等級，其由居處至機場之旅費亦由中方支付；四、顧問在臺期間免費居住國軍招待所及免費供給膳食，並供給公務使用之交通工具。

83 BA-MA, N 447/89, Grundzüge des Arbeitsprogramms für das Ming-teh Projekt.

84 《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上冊，「第十三次來華工作建議資料」，128~129。

格式，不夠機動、靈活。」在孟澤爾撰述「明德工作十三年」的工作報告中，他坦率指出，「由於師承美式的觀念，中華民國的整個軍事組織犯了頭重腳輕的毛病，而美國之所以能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純因掌握物資上的絕對優勢。」[85]

實際上，德籍顧問對國軍軍事革新所提出的建議涵蓋作戰、訓練、教育、人事、後勤、外島防衛等各方面。由於他們專業與務實存真的態度，其中絕大多數建議獲得蔣介石的肯定與重視。蔣氏曾言：「美國顧問不提出批評，德國朋友們的態度很好。」[86]事實上，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外籍軍事顧問中，真正能以專業、體諒與包容的態度對待蔣介石政權並積極地協助訓練國軍，同時又能直言不諱，指出存在於國軍中的弊端與提出改革建議的唯有德籍顧問。不過，當時軍中的客觀環境並不利於落實德籍顧問所提出的改革建議，特別是有關軍隊縮編的問題，在反攻大陸已成為不可觸碰的軍事教條下，如何將軍隊裁減的建議付諸實行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時，此項建議也難以獲得高階將領們的支持與諒解，因為大幅裁減指揮單位與兵員，將直接衝擊到他們的晉階機會與通向權力之路。更重要的是，德籍顧問對軍中事務之缺失「過於坦白」的批評與建議，激怒了部分國軍高層將領，不僅傷及相關人士的顏面，甚至影響到他們在軍中的發展。[87]

此外，國軍高層中仍有部分人對於德軍指揮參謀原則抱持消極抵抗態度。德國顧問認為國軍高層抵制新觀念，並不是對觀念本身有疑慮，而是墨守成規的惰性與本身的專業程度有限，沒有能力分辨美式與德式指揮參謀原則在精神與方法上的不同。德國顧問也曾抱怨，雖然蔣介石

85 BA-MA, N 447/62, Die Arbeiten der Ming-teh Gruppe 1963-1975, 2.

86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總統召見孟澤爾教授及傅德武貝克上校之談話紀錄（1968.5.21）。

87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600。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主持軍事會議，強調德國顧問的意見值得重視並叮囑陸軍切實遵照建議實行。而參謀本部卻認為，顧問建議有些雖然可行，但有些則礙於國情，實際上不易實施，因此在落實執行層面上打了折扣。有關軍方意見與執行成效，參見陳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明德專案工作研究〉，341~345。

本人處心積慮地謀求軍事組織的改革，希望將國軍改造成為機動、具高效率的勁旅，但在軍事最高首長的人選上又不能做到「用人唯才」。而這種用人方式，最後卻成為他的構想窒礙難行的主因。[88]

總體而言，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雖持續十三年，然而各顧問在臺工作停留時間極短，每年僅能完成有限度之目標，且除孟澤爾外，其餘顧問人事異動頻繁，工作難求連貫，不僅影響到訓練計畫的完整性，對國軍建軍備戰等相關問題亦難有整套而有系統之建議。[89]其次，當時美軍協防臺灣，美軍顧問團才是扮演支持臺灣國防的主要角色。在此情況下，德籍顧問可發揮的空間原本就不大，加上國軍高層將領，除少數如七〇年代初期任職陸軍總司令的于豪章較為支持外，多數將領在心態上對德國軍事顧問的工作並不完全認同，多持虛應故事態度，配合意願不高。孟澤爾即曾指出，其在工作上遇到的首要困難即是國防部高層不願接受顧問所提出的適宜批評，他並認為蔣介石應為此現象負責。[90]事實上，蔣介石本人相當重視德國軍事顧問的工作，德國顧問在臺工作前十年期間，幾乎每年工作終結時，均會親自召見顧問談話，並屢次要求德國顧問提出具體批評，並多所肯定顧問的建議。[91]然而自一九七二年最後一次召見顧問後，由於健康因素，蔣氏即未再過問顧問工作事。

此外，實際負責督導「明德專案」的蔣緯國在軍中並非居於決策核心地位，對相關軍事決策影響力有限，而曾經接受過德國代訓的又多屬中下級軍官，人數有限，很難擴大德國顧問在軍中工作的影響層面。因此當一九七五年四月支持德國顧問來臺工作的主要人物——蔣介石逝世，臺灣高層即決定不再約聘德國退役軍官來臺擔任軍事顧問，為長達十三年的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畫下了句點。[92]

---

88 BA-MA, N 447/90, Munzel an Dethleffsen, March 21, 1969.

89 《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上冊，279~283：副參謀總長鄭為元上將約見孟澤爾教授談話紀錄（1971.4.29）。

90 BA-MA, N 447/90, Munzel an Dethleffsen, March 21, 1969.

91 Oskar Munzel, *Erinnerungen*, 58.

92 《國軍檔案》，檔號430 3030〈進德專案〉：明德專案連絡人室民國六十四年進德案工作期終檢討（1975.5.12），8。

（三）軍事採購與技術合作

相對於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成效不彰，在此期間德臺雙方對於武器裝備採購、人員訓練與技術合作等事項，互動卻是愈形密切。德籍顧問除負責蒐集德國軍事學校教育計畫與軍事典令，並提供若干小型軍事器材，如無線電以利部隊訓練，同時也與德國工商界連絡探詢若干軍事用途機具及工程之採購，[93]此外，國防部更委託德國顧問在德蒐集軍事通信電子器材資料。[94]一九六三年夏，由於蔣介石指示：「從速籌建兵工廠，祕密進行機器之採購，並在西德辦理」而陸續開展的「建新專案」，最足以說明雙方軍事採購的密切關係。緣自一九六三年初，蔣介石為準備軍事反攻大陸，並擺脫美方的後勤補給牽制，決心推動兵工研究與生產製造，建立自主的國防。[95]

由於美方對於臺灣建立引信、軋銅以及火藥工廠等政策未必贊同，尤其是所用的機器技術均引自德國，而未向美國採購，更易引起美方的疑忌。[96]因此建立此類工廠，是在對美方絕對保密的情形下，透過國家安全局與聯邦情報局管道直接向德國採購機器設備。[97]其間我軍方除多

---

93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蔣副院長約見孟澤爾教授一行談話紀錄（1971.5.3）；國防部長黃杰將軍約見孟澤爾教授一行談話紀錄（1971.5.4）。

94 《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國防部（60）勁昌字第4602號令（1971.10.5）。柯赫顧問曾幫我方蒐集砲兵電子計算器以及語音保密器等器材資料。

95 雷嶺，《造化遊戲四十年：雷嶺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89~90, 95；《賴名湯先生訪談錄》，263。由於國軍之戰力必需自立更生，新型武器彈藥的生產能力至為重要，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中旬，國軍第五屆軍事會議中，蔣氏即指示聯勤總部兵工生產署，積極籌建砲彈用新型M51A3引信廠，此案即成為「建新一號」專案。此後陸續下達命令，計有「建二案」軋銅廠、「建三案」TNT炸藥廠、「建四案」火藥廠。由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蔣氏更陸續指示「建新計畫」案，籌建及擴建六個新廠，負責生產各種口徑砲彈，即建新五　十案。一九六七年，兵工生產署奉令續辦「建新十三號」籌造破甲槍榴彈案、「建新十四號」海軍五吋砲彈籌造案、「建新十五號」四．二吋迫擊砲籌造案與「建新十六號」七六公厘破甲曳光彈籌造案。

96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267~268。

97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263~264、266。其中引信廠、軋銅廠與炸藥廠的機器採購與

次赴德採購技術資料與機器設備外，並曾派技術人員在西德兵工廠內見習其實際生產程序與技術。[98]另外，為製造精密度高的一〇五、一五五榴彈砲，聯勤單位也自德國購進砲管拔來福線的機器與砲身自緊設備兩項高科技機械設備。德方兵工廠不僅負責代訓國軍技術人員有關機器裝備操作、故障排除與維護保養事宜，更派遣工程師來臺負責聯勤二〇二廠機器安裝試車，自此國軍擁有獨立生產威力強大的榴彈砲能力與生產線。[99]

與此同時，臺灣軍方亦多次透過派員赴德參訪，加強與德國軍方的軍事交流。其中較具規模的，首推一九六六年夏以七名將校組成的「中華民國西德軍事訪問團」，赴德考察德國陸軍主要戰鬥部隊之訓練。由於兩國之間並無正常之外交關係，為免引起外界臆測，訪問團之編組盡量縮小並採非正式之訪問方式進行。[100]次年一個主要由兵工軍官組成的訪問小組參訪德國國防工業，除接洽採購兵工機具設備外，更擬引進德製反戰車飛彈等敏感軍事裝備。[101]即便西德已決定在一九七二年十月與中共建交，處於政治敏感的氛圍中，同年十月上旬，陸軍總司令于豪章仍在聯邦情報局與孟澤爾的安排下，於赴歐參訪回程中率員訪問西德，[102]期間不

建立，均循同樣模式。而為籌設砲彈引信廠，一九六四年聯勤總部四四兵工廠廠長親赴西德選購機器設備。

98 雷穎，《造化遊戲四十年：雷穎回憶錄》，90~91。

99 PA, B 44/vol. 304, 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August 6, 1964；陳笏，《霹靂神火——中華民國火砲傳奇》（臺北：尖端科技，2001），143~144、162~165。

100 《國軍檔案》，檔號 1930.1 7421〈陸軍改制（1）〉：總長彭孟緝呈總統關於陸軍訪問西德計劃（1965.3.31）。

101 雷穎將軍訪談（2001.10.15，臺北）；雷穎，《訪問德國、以色列兵工生產報告》（未出版，1967），6~7，附件三、七。該訪問小組訪問德國三週，期間曾參觀十一家工廠，其中包含位於慕尼黑（München）的伯爾考夫（Bölkow）總公司及其分廠三處，該公司主要產品為眼鏡蛇反戰車飛彈；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萊茵金屬公司（Rheinmetall），主要產品為自動步槍、機槍與九〇戰車砲。

102 王玉麒先生訪談（2001.9.5，臺北）。此次隨行有陸軍總部作戰署署長宋心濂少將和隨員王玉麒上尉。王氏於一九六八年曾任孟澤爾在臺期間的侍從官，一九六九至一九七

僅赴慕尼黑訪問德軍工兵學校與參觀工兵渡河作業演習, 更前往德國最大規模的航空科技公司暨武器出口商MBB（Messerschmitt-Bölkow-Blohm GmbH）瞭解其有關BO-105戰鬥直昇機、米蘭（Milan）反戰車飛彈、羅蘭（Roland）防空飛彈和「塘鵝」（Kormoran）空射反艦飛彈的產銷情形。[103]事實上, 此類參訪活動同時也帶有軍事採購性質, 不僅能為德國國防工業創造利潤, 又能營造雙邊軍事交流的氣氛, 彌補臺灣對兩國間缺乏正式邦交而無法公開進行外交活動的缺憾。因此, 德國軍方與聯邦情報局對於臺灣方面提出的參訪要求通常採取比較寬鬆的標準來處理, 只要類似的活動在不對外公開的情形下進行, 德方都能盡量配合。[104]

（四）德國代訓臺灣軍官計畫

與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工作的同時, 德臺之間也發展出其他的軍事交流計畫, 代訓國軍軍官即是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與德臺情報合作衍生的產物。對於與德國合作的國家而言, 選派軍官赴聯邦防衛軍軍事院校受訓, 向來是極具吸引力的交流項目, 這與德國具有優良軍事傳統的因素密切相關。[105]早在孟澤爾首次來華工作時期, 他就曾代臺灣當局向德國有關單位轉達了選派優秀軍官赴德接受指揮參謀教育及部隊見學, 以培養其成為軍中日後推動改革工作的教官之建議。對此德方很快就作出了正面回應, 在聯邦情報局的協調下, 德國國防部同意每年額外給予臺灣二到四名訓練名額。[106]由於臺灣與西德間沒有正式邦交, 這個軍方的交流案仍是循雙方情報機構管道辦理。我方以國家安全局為主辦單位, 而所有派赴德國受訓或見學的國軍軍官, 抵德後則統由聯邦情報局官員負責接機並安排相關事宜。[107]

○年派赴德軍山地旅見學。回國後歷任陸軍連、營長，並七度參與明德工作。

103 王玉麒，《明德專案——德國軍事顧問在臺工作秘史》，37。

104 Interview with Hans Joachim Urban, December 10, 2003.

105 Joachim Tzschaschel, *Zeitseuge in Bagdad*, 102.

106 BA-MA, N 447/90, Munzel an Liu An-chi, December 5, 1964.

107 BA-MA, N 447/90, Herz an Munzel, January 30, 1969; 王玉麒先生訪談（2001.9.5）。臺

該項臺灣軍官赴德受訓計畫第一期於一九六四年初展開,[108]選派赴德受訓的國軍軍官層級介於中尉至中校, 德國軍方除盡力配合外, 在經費上也予以支持, 受訓軍官在德軍事訓練費用, 概由德方承擔。[109]從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三的十年期間, 臺灣軍方共甄選了九批, 二十五人（二十七人次）赴德國聯邦防衛軍指揮參謀學院與各部隊受訓。[110]當時德軍指揮參謀學院也接受為數眾多由國外選派來的外籍軍官學員, 不過卻按照學員身分國別, 區分為不同受訓課程。如為北約成員國, 其受訓軍官接受之課程訓練比照正式德軍。如為非北約成員國, 則單獨安排「中級指參班」（Generalstabslehrgang Mittlere Führung）教學, 並指派一組德籍軍官（五名）參與輔助學習, 其受訓時程也縮短為一年, 課程重點僅在於德軍指揮原則與中級（旅到軍級）戰術與戰略的教授, [111]臺灣軍官即是接受後者受訓課程。

姑不論軍官短期訓練成效如何, 單就一九四一年中德斷交後, 二十餘年來中華民國軍官首度分批赴德國軍方受訓的事實而言, 其本身就是

灣方面則由以中央信託局駐西德代表名義掩護的國家安全局代表戴安國（1912~1984）負責對德籍顧問的連絡工作與留德軍官照顧等業務。

108 詳見《國軍檔案》，檔號 0600 6015〈國軍軍官選送西德、奧地利進修（1）〉。

109 PA, B 14-IIA7/vol. 767, Der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July 9, 1963; Der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March 2, 1965.

110 國軍軍官赴德受訓的整個時程是十八個月：固定從首年元月底或二月初啟程，到次年八月初返國。除前六個月語文學習階段外，部隊見學的軍官被分發到本兵科或相關兵科的營級部隊，以一年的時間見學部隊實務與演訓，並在兵科學校接受短期班隊訓練（如連、營長訓練班、射擊教官班等）。而指參班的軍官則被分發到旅級單位，以兩個月的時間見學德軍的幕僚作業，然後赴漢堡指參學院參加為「非北約成員國」所開設的「中級指參班」課程。參見陳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明德專案工作研究〉，339~341。

111 PA, B 14-IIA73/vol. 767, Der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March 2, 1962; Ulrich de Maizière, *In der Pflicht. Lebensbericht eines deutschen Soldaten im 20. Jahrhundert* (Bonn: Mittler & Sohn, 1989）, 241-242. 指揮參謀學院 （Führungsakademie）旨在培訓三軍中級與高級指揮參謀軍官，使其具備單一軍種或聯合軍種指揮能力。課程重點在於戰術、作戰指揮、戰略與安全政策之教授。所有受訓軍官皆經過嚴格篩選，約僅十分之一同年次的軍官得以通過入學甄試，並接受為期兩年半的訓練。

極具意義的外交突破。事實上自中德斷交後，在戰後德臺雙方除軍事顧問來臺外，稱不上有其他具體的雙向軍事交流，直至派遣軍官赴德受訓開始，德臺在軍事關係上才得以擴大雙方交流的面向。不過臺灣軍官赴德受訓的計畫雖然順利啟動，畢竟它只是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與德臺情報合作的副產品，在德國聯邦情報局被動配合以及臺灣軍方缺乏有計畫與制度推動下，充其量也只能稱之為「交流個案」，尚無法建立「交流模式」。易言之，德臺雙方都無具體有效措施使得類似的軍官培訓計畫制度化。

該項代訓計畫與軍事顧問一樣都是在不曝光的原則下祕密進行，最後該計畫的結束主要與德中建交有直接的關連，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波昂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後，德國外交部於同年十月十二日正式下達終止該項訓練援助的指令，合作案乃於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隨著最後一批結訓軍官回國而宣告結束。[112]

五、結論

戰後德國囿於「一個德國」政策，不願在臺海兩岸主權爭議問題上採取政治選邊的作法，因此西德與臺灣的關係僅侷限於經貿與文化方面合作，無法在政治層面上開闢新的對話管道。[113]不過由情報合作與軍事顧問兩例卻顯示，德國方面的立場仍然具有彈性，只要找得到合適的形式或是交流的切入點，與臺灣合作仍然可以進行。事實上，冷戰時期由於東西方意識型態對立，臺灣憑藉著地理位置與反共立場的因素，在東西對抗的國際局勢中，烘托出本身的戰略地位。再加上中共意識型態掛帥，在對外關係上缺乏彈性，因此使得臺灣得以保持住和本身國力並不對稱的國際地位。

112 PA, B 14/vol. 1885, Das Auswärtige Amt an 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October 12, 1972.

113 Archiv für Christlich-Soziale Politik, NL Strauß BMF:117, Brandt an Strauß, March 23, 1968.

而六〇年代初德臺軍事交流的本質，不僅符合雙方國家安全策略，更是冷戰形勢下，雙方基於國際現實的一種政策選擇。就雙方軍事交流的實質內容而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為兩國達成實施情報交換、互惠之共識。一九六〇年初中蘇共外交關係惡化及其可能對蘇聯德國政策的影響，讓西德政府深刻體認到對中國事務的生疏與資訊不足。[114]為要迅速應對共產集團內外交局勢的變化與中國的周邊態勢，與地緣關係密切且同為反共陣營的臺灣進行政治與軍事防衛情報交流，就成為德方考量與臺灣互動的行為模式。[115]因此德臺在各自國家利益的出發點上——德國基於戰略安全考量並迂迴其在中國政策上維持中立的立場，臺灣則欲藉由軍事交流以漸進達成與德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展開戰後雙方另類的情報外交。此項合作計畫是由雙方最高情治機構——聯邦情報局與國家安全局負責督導執行。鑑於情報機構異於一般部會的工作特性與隸屬關係，因此軍事交流交由雙方情報機構來操作，不但避免了來自德國外交系統的牽制與兩國間並無外交關係的尷尬處境，而且能夠直接在兩國政府高層間建立聯繫管道，為冷戰時期德臺軍事交流合作樹立了成功的模式。

此外，在雙方情報合作的基礎上，德國方面應臺灣要求也提供軍事顧問與代訓國軍軍官另外兩種交流項目，從而擴大了德臺軍事交流的面向。事實上，為能擷取德國傳統軍事思想、制度與學術精粹，作為改進國軍組織體系、精進部隊訓練與提昇戰力，以作為反攻復國之根基，自五〇年代起蔣介石就曾試探尋求向西德延聘優秀將校來臺擔任軍事顧問。[116]在他認為，德國軍事歷史之發展，一向注重以寡擊眾與經濟有效

114 Reinhard Gehlen, *Der Dienst*, 276-77.

115 Reinhard Gehlen, *Der Dienst*, 303-305. 蓋倫的回憶錄中提到有關六〇年代中國情勢的研判，均以「來自可靠的情報消息」作為依據。尤其是一九六四年中共核子試爆的機密情報，德方也知之甚詳，其中顯示之意義在於德方此時顯然已與國外情報機構進行高層級的情報交換合作，而當時熟悉中共事務又能提供德國情報機構可靠的中國情報者首推臺灣。

116 BA-MA, N 246/19, von Falkenhausen an Chiang Wego, October 5, 1952; Chiang Wego an von Falkenhausen, January 16, 1953.

之建軍原則，且由於兩次世界大戰與戰後重整軍備的實際經驗，舉凡部隊編裝、教育訓練、動員戰備與研究發展各方面，均對國軍有指引效法之處。[117]此外，藉由軍事顧問的聘任，臺灣不僅能強化和德國情報機構與國防部各級單位的溝通管道，更能藉其影響力與德國民間國防工業建立聯繫，[118]為向國外採購武器裝備開闢除美國之外的另一條通路。因此，蔣氏看重德國軍事顧問工作的重要性甚至超過雙方情報合作，從他幾乎每年親自召見顧問徵詢軍事興革意見一事，即可見一班。然而，無論是聘請德國軍事顧問或是選派軍官赴德受訓，臺灣軍方所著重的都只是侷限於一些外在有形方面，如德國軍隊的編制、訓練動作和戰術戰技等事務，卻忽略了學習德國軍事精神無形方面，如軍官的本職學能、領導統御與軍人氣質等特質。特別是在德國軍事顧問對國軍編制與指揮結構提出建議這件事上，蔣介石與國軍領導階層心理上仍拘泥於「反攻大陸」的教條中，跳脫不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窠臼，以致在軍事事務革新上流於形式而無法有效落實。

雖然德國軍情系統刻意模糊其官方對中國問題上所保持的中立政策，而與臺灣進行軍事交流，但是直至一九七二年十月西德與北京政權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決定停止德臺軍事交流為止，西德政府從未改變與臺灣的交往基礎，亦即西德迴避與臺灣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即使臺灣不斷努力，透過情報合作、軍事顧問以及軍事人員受訓等方式，維持兩國間非正式的國防與情報溝通管道，並冀望進一步與德國建立包含文教、經貿與政治等多層次與多管道的對話機制。但是囿於德國對華政策的原則與限制，多年來雙方經營的軍事交流模式，對德臺雙方的外交關係正常化並未能產生觸媒效應，致使兩國外交關係無法出現臺灣所預期的根本性調整。

不過，就六〇年代中雙方在缺乏外交關係的現實下，德臺情報機構與軍方透過情報合作、派遣軍事顧問與代訓軍官等模式建立起非正式的

11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上冊，1。

118 《明德專案工作紀實》，上冊，295~296：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與考夫曼教授談話紀錄（1972.6.28）。

政府間接觸的事實而論，藉由情報合作與軍事交流的模式，德臺雙方在技術上克服了政治上的障礙，在傳統外交管道外，開闢了新的政治運作空間。不僅為雙方自一九四一年後中斷的歷史關係尋找到新的接續點，同時也維繫住雙方政府層級間的聯繫，更為冷戰國際情勢下的德臺雙邊關係賦予了特殊的歷史意義。

附表一：在華德籍顧問名錄與工作時間表

來華次別	姓名	配屬單位/工作職掌	日期	
			來華	離華
1	Oskar Munzel Bernhard Faerber Gottfried Garzini	陸軍總部	Nov. 9, 1963 Nov. 9, 1963 Feb. 4, 1964	May 2, 1964 Jan. 3, 1964 April 5, 1964
2	Oskar Munzel Gerd Volkmann	陸軍總部	March 16, 1965 April 2, 1965	May 30, 1965 May 30, 1965
3	Oskar Munzel Wilhelm Wissman Gerd Volkmann Albert Prell Herbert Tilgner	陸軍總部	Oct. 22, 1966 Oct. 26, 1966 Oct. 26, 1966 Jan. 19, 1967 Jan. 19, 1967	March 18, 1967 Nov. 27, 1966 Dec. 14, 1966 March 18, 1967 March 18, 1967
4	Oskar Munzel Albert Prell Klaus Vollmer	陸軍總部	Jan. 25, 1968 Jan. 25, 1968 March 16, 1968	May 22, 1968 March 10, 1968 May 15, 1968
5	Oskar Munzel Paul Jordan Theodor von Dufving	國防部 陸軍總部	Dec. 7, 1968 Jan. 18, 1969 Jan. 18, 1969	March 6, 1969 July 17, 1969 July 24, 1969
6	Oskar Munzel Cord von Hobe Joachim H. Nagel	國防部 參謀總長顧問	Feb. 19, 1970 Feb. 19, 1970 Feb. 19, 1970	May 8, 1970 May 8, 1970 May 8, 1970
7	Paul Jordan Alfred Jaedtke	陸軍總部	Aug. 6, 1970 Aug. 6, 1970	Dec. 5, 1970 Dec. 5, 1970
8	Oskar Munzel Heinz-Günther Koch Alfred Jaedtke	陸軍總部	Feb. 5, 1971 Feb. 5, 1971 Feb. 5, 1971	May 14, 1971 May 14, 1971 May 14, 1971
9	Oskar Munzel Kurt Kauffmann Alfred Jaedtke Siegfried Krüger Rudolf Krüger	參謀總長顧問 陸軍總司令顧問	Jan. 14, 1972 March 5, 1972 Jan. 14, 1972 Jan. 14, 1972 Jan. 14, 1972	April 1972 June 15, 1972 April 1, 1972 June 15, 1972 June 15, 1972
10	Kurt Kauffmann Dr. Manfred Kublitz	教授團團長 指導砲兵訓練	Jan. 15, 1973 Jan. 15, 1973	May 11, 1973 May 11, 1973

	Friedrich-Wilhelm Boehme Josef W. Rettemeier Horst Riemann Konrad van Beuningen Dr. Reinhold A. Klebe	指導防空訓練 指導裝甲兵訓練 指導步兵訓練 指導陸院戰術教學研究 指導山地部隊訓練	Jan. 15, 1973 Jan. 15, 1973 Jan. 15, 1973 Jan. 15, 1973 Jan. 15, 1973	May 11, 1973 May 11, 1973 May 11, 1973 May 11, 1973 May 11, 1973
11	Kurt Kauffmann Konrad van Beuningen Friedrich-Wilhelm Boehme Horst Riemann Dr. Manfred Kublitz Josef W. Rettemeier Dr. Reinhold A.Klebe	教授團團長 指導陸院戰術教學研究 指導防空訓練 指導步兵訓練 指導砲兵訓練 指導裝甲兵訓練 指導山地部隊訓練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Jan. 28,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May 25, 1974
12	Oskar Munzel Heinz Schneider	國防部 指導民防訓練	Oct. 6, 1974 Oct. 6, 1974	Nov. 8, 1974 Nov. 8, 1974
13	Kurt Kauffmann Konrad van Beuningen Friedrich-Wilhelm Boehme Horst Riemann Dr. Manfred Kublitz Josef W. Rettemeier Dr. Reinhold A. Klebe	教授團團長 指導陸院戰術教學研究 指導防空訓練 指導步兵訓練 指導砲兵訓練 指導裝甲兵訓練 指導山地部隊訓練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Jan. 15,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May 11, 1975

資料來源：《國軍檔案》，檔號430 6702〈明德專案〉。

（責任編輯：楊宗霖　校對：吳立仁　林思妤）

The Military Exchange between West Germany an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Cold War, 1961-1975

Chen, Chern*

Abstract

After Nationalist China severed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Germany in July of 1941, the clos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established from the 1930s failed to resume. The Cold War bega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Limited by her "One Germany" policy, the newly formed West Germany tried to avoid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sovereignity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Except for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existing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t up any political channels for dialogue.

Although there were no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est Germany and Nationalist China still maintained unofficial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by means of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military advisers, and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 from the 1960s. Until 1972 when West Germany recognized the Peking regime and decided to interrupt the military exchange, West Germany and Nationalist China had overcome political obstacles and opened up new political space through military exchanges and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outsid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channels. The exchanges not merely maintaine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t government levels after the war, but also gave a speci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f the Cold War.

Keywords：Cold War, military exchange, "One Germany" policy, intellegence cooperation, military advisers.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